

祖国丛书



祖国丛书

延安整风始末

华世俊 胡育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祖国丛书

延安整风始末

华世俊 胡育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同宝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延安整风始末

华世俊 胡育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插页 2 字数 59,000

1985 年 4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0 册

书号 11074·649 定价 0.49 元

ZUGUO CONGSHU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是养育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母亲。

编辑出版《祖国丛书》旨在全面、形象、真实地展现祖国的风貌，帮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焕发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情。

丛书的主要内容，有祖国的建设新貌、悠久历史、锦绣河山、灿烂文化、科技成就和杰出人物等。它以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读者为主要对象，编写上力求形式新颖、通俗生动、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这套丛书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三家共同出版。



书号 11074·649

定价 0.49元

目 录

前 言

- 1 从 1940 年再版王明的小册子谈起(1)
- 2 空前未有的学习高潮——整风的准备阶段 (1938 年 9 月——1942 年 2 月)(8)
- 3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普遍整风阶段 (1942 年 2 月——1943 年 10 月)(21)
- 4 延安文艺座谈会(44)
- 5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57)
- 6 审查干部运动(65)
- 7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1943 年 10 月——1945 年 4 月)(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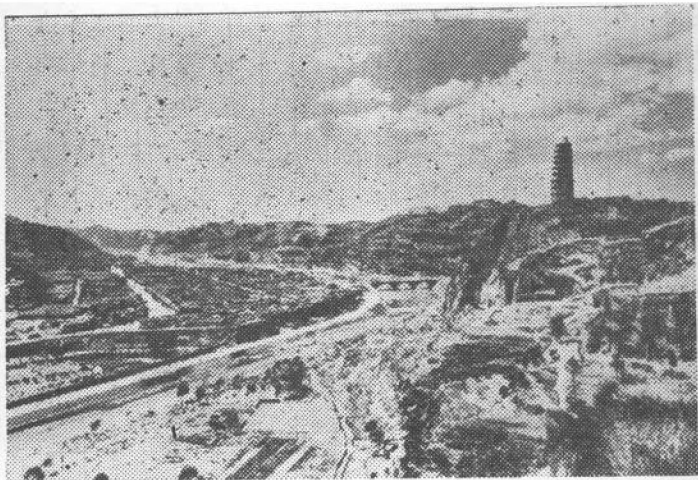
**8 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和方
法(83)**

附录 大事年表.....(91)

从 1940 年再版王明的小册子谈起

王明小册子的再版说明了什么？

王明在三十年代初写过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叫《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代表作。王明原



革命圣地延安全景

是一个青年学生，1925年五卅运动中，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帮助中国革命而创办的一所政治学校。在“中大”学习期间，王明虽然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却没有懂得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他善于背诵书本上的某些词句，却不懂得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他自命不凡，夸夸其谈，自诩理论水平很高，看不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致肆意进行反对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宗派活动。1929年4月回到中国后，王明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爬上中国党的领导岗位。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①以后，他就借反对立三路线为名，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于当年11月写了《两条路线》。这本小册子先在王明的小宗派中传阅，接着就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传布。由于这本小册子抄摘了大量马列著作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用教条主义吓唬了一部分人。又由于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了不少宗派活动，竟使这个原来什么领导职务也没有的教条主义者，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大权。王明是靠这本小册子起家、上台的，又以这本小册子作为纲领，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从1931到1934年，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导致了第五次

^① 六届三中全会于1930年9月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全国的革命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王明写的这本小册子，贻误全党，危害极大。

这本小册子，在王明错误路线的统治期间，曾于1932年2月在上海正式出版，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时隔八年之后，在经过了革命的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这样重大的历史曲折，经过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后，这本小册子居然又能在1940年3月于延安再版，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而且，在“三版序言”中，王明还大言不惭地说：“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为什么在党的历史上起了极坏作用的这本小册子，还能在1940年再版？为什么王明在“三版序言”中能这样自我吹嘘？这一方面说明王明本人对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还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还认识不清，对党内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者的面目还没有识破，以致这种假马克思主义还能继续蒙骗一部

分人。

而问题严重的是，当时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也缺乏统一的认识。1940年12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其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干部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等待这些同志觉悟，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就不提“路线”两字，只提“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情况，说明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没有认真研究，认识还有分歧；说明王明错误路线对党的严重影响，还远未肃清。

因此，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进行全党整风的第一个原因。

对大批新党员需要进行教育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进行整风，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四万人，发展到

1940年的八十万人，增加了十九倍。这些党员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据延安中央研究院统计，当时该院党员中，抗战时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二。这些新党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些是因国难当头，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来到延安寻求光明的；有的是不堪忍受地主老财的残酷剥削，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奔革命的；有些是受“一二·九”运动的推动，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有的则是受上海左翼文化界的影响，走向进步的。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严酷的革命斗争考验，往往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进党内来，加深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已经入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而在这期间，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还比较贫乏，对于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还缺乏识别能力。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和欣赏一些空洞的革命词句；容易受教条主义者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正确的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这是一个新的严重的问题。因此，通过整风，提高广大新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

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使他们在世界观上来一个彻底改造,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战胜严重困难的决定性环节

1941 和 1942 年,我们党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对付我抗日根据地,到 1941 年,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的兵力达到了侵华总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1942 年为百分之六十三。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了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

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也加紧了反共的罪恶活动。继 1939 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 年初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配合日本侵略者对解放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这样,就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解放区面积缩小了,人口由一亿人下降到五千万人;八路军由四十万人减少到三十万人,新四军由十三万五千人减少到十一万人。解放区的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先后

制定和实行了“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这十项政策中，又以生产和整风两项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革命环境，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组织上的更加统一和巩固，这对于从精神上战胜严重困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1941和1942年也是我党开展整风的较好时机。当时，解放区虽然有所缩小，但是，各抗日根据地仍雄踞敌后，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站住了脚。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把侵华兵力大部分用来对付解放区战场，但是他们没有力量把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消灭掉。这样，解放区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党可以抓住这局势变化较少的时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

空前未有的学习高潮 ——整风的准备阶段

(1938年9月——1942年2月)

延安整风是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准备，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胜利结束的；但是在全党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风，是在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期间，通常所说的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指在全党干部中普遍开展的整风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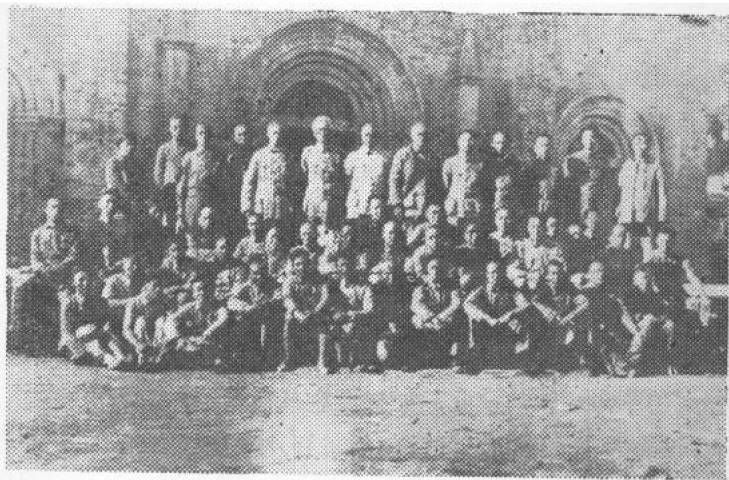
延安整风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普遍整风阶段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现在就从准备阶段谈起。

全党学习竞赛的开始

延安整风是有准备、有领导、有步骤地展开的，它有一个酝酿和准备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从遵义会议就开始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

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过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从政治路线方面和军事路线方面，批判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努力倡导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许多同志由于吃够了不学理论的“苦头”，求知若渴，因而学习的空气逐步高涨。



六届六中全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从保安搬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在此前后，党相继开办了各种学校，如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

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等等。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的有老干部，有领导干部，有工农干部，还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发奋苦读，思想和学识水平有显著提高。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这就为整风运动的开展，创造了一个根本条件：党中央的领导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从而开始了全党的学习热潮。延安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一场革命，必须以开展学习为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整风准备阶段的开端。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号召：从我们这次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

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会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组织全党的学习:

一是加强领导。1939年2月17日,党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张闻天)为部长,罗迈(李维汉)为副部长。5月20日,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大会,进行动员。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发扬“攻读”的精神,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1940年,中共中央又先后于1月和3月分别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切实加强学习的领导。

二是拟订学习计划,建立学习制度。1939年3月中央宣传部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的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如党中央由陈云领导的小组,有计划地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资本论》等书籍。张闻天领导的小组,专门学哲学,由艾思奇担任指导,经常参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肖劲光等。1940年3月,党中央又规定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为“学习节”。要各单位届时总结学习经验,对学习好的进行奖励。许多单位还加强了学习纪律,严格规定缺席必须请假,无故缺席者,第一次组长指责,第二次小组批评,第三次受警告。

三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